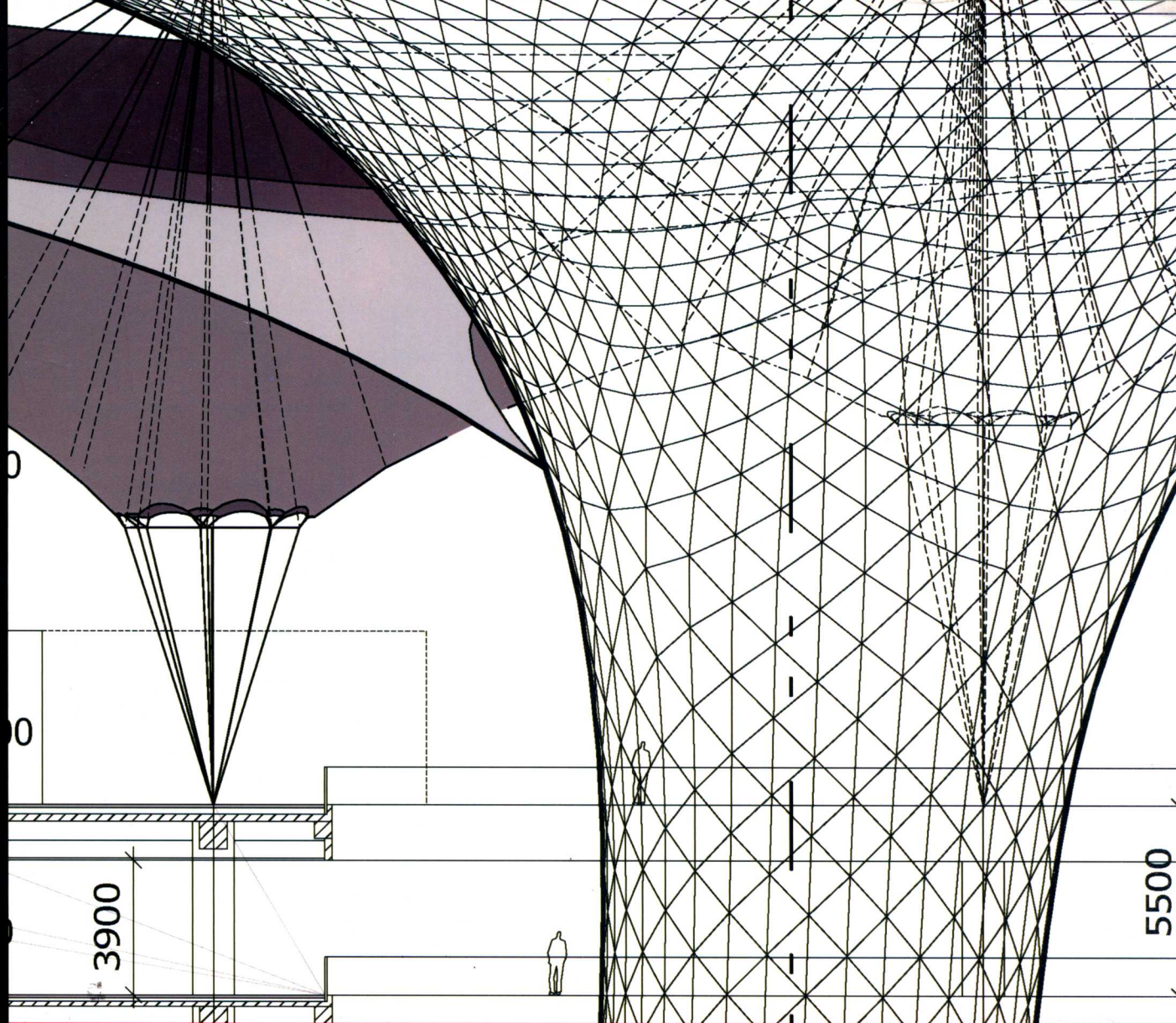




SUSTAINABILITY

IN URBA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GERMAN DESIGN IN CHINA

可持续城市和建筑 ——德国设计在中国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持续城市和建筑: 德国设计在中国 / 匡晓明主编;
《城市中国》编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608-4859-4

I. ①可… II. ①匡… ②城… III. ①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①TU984.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1065号

可持续城市和建筑——德国设计在中国

SUSTAINABILITY IN URBA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GERMAN DESIGN IN CHINA



Germany and China -
Moving Ahead Together



编 著 《城市中国》
主 编 匡晓明
顾 问 Dieter Hassenpflug教授, Wilfried Eckstein
协 调 陈彦可
统 筹 唐凌洁
采 编 (按首字母顺序排列)
陈昊、丁馨怡、范佳妮、欧阳梓、唐凌洁
翁桐润、袁菁、张辑、张宜轩、张莹
责任编辑 陈立群
责任校对 徐春莲
书籍设计 卢涛、成国强(封面)
出 品 支文军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92) 中国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www.tongjipress.com.cn

印 刷 上海锦良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6
印 张 10
字 数 320 000

书 号 ISBN 978-7-5608-4859-4
定 价 120.00元

项目由德中同行发起,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与《城市中国》共同组织, 并由《城市中国》制作完成。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SUSTAINABILITY

IN URBA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GERMAN DESIGN IN CHINA

可持续城市和建筑 ——德国设计在中国

同济大学出版社

序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在中国六个地区举办了“德中同行”系列活动。活动最重要的主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本书中是一系列会议的成果，它们都围绕着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主题：追求面向未来的城市生活方式，保护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重新定义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在德国社会中，这个话题早在40年前就已经有了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对它的关注才刚刚开始。事实上，世纪盛事上海2010世博会选取了这一主题，正好凸显了主办方的智慧。在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政府声明”也就是十二五规划中，这个话题也占有重要地位。

正因为如此，德国政府放弃使用核能，在未来集中经济力量和专有知识开发环保型能源载体的决策才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德国正处在通往新的可持续文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广泛的共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履行一项国际性义务。这项义务的产生要追溯到1997年京东议定书以及哥本哈根和墨西哥气候会议，我们认同会议制定的国际气候目标。我们要把全球气温升高值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讲，这一目标是可实现的。然而，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则要求国家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国都积极参与进来。以发达工业国家为首，大型新兴工业国家在此也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作用。此外，它还需要个人的主动参与。

在这条道路上，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是我们重要的伙伴。他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帮助，比如，通过更为全面综合的城市规划来满足城市居民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以避免个人交通瘫痪。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在设计和建造日常居住、工作和休闲场所时尽可能降低这些建筑物对环境的负担，最好能让它们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有利于环境保护。

在建筑物环保节能领域，德国自70年代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由此产生的“生态建筑设计”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因素，即寻求另外的生活方式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两个因素是构建可持续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今天，中国已经有45%的人生活在城市，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超过60%。在未来，城市人口密度还会增大。比德国首都柏林大的中国城市的数量会从100增加到200多。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目前城市生活不断地导致能源消耗量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节能潜力。在环保节能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建筑物的质量。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碳排放超量的问题，超过50%的责任应由建筑物来承担，远远高于交通及工业。我们必须意识到，只关注短期利益的建筑设计和施工会进一步加重环境负担，破坏环境所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会转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因此，我们应该担负起责任，参与到目前已初步成型的解决方案中去。

在全球共同探索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德国一贯积极参与。我们可以把我们探索各种方法和方案的漫长历程引入到德中会谈中。自40年前起，我们就拥有了一批专家、企业家、政治家和个人，他们把保护地球视为己任。正是借助了他们的能力，德国才踏上了探索配得上“可持续性”这个称号的最佳建筑和城市体系的道路。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因此受到了中国专家和公众的关注。在此，我主要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来自杜塞尔多夫、汉堡、不莱梅和弗莱堡的例子，这些城市都受邀参加了2010年世博会。它们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典型例子，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德中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方向。

回顾过去，众多关于新型建筑物的实验具有指导性意义，比如著名的太阳能旋转屋。现在，德国建筑师在房屋建造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仅让房屋实现了节能目标，还能实现积极的碳排放结果，不给环境造成任何负担。

对低碳住宅和生活方式的追求还远远没有停止。现在我们明确了一点，以可持续为目标的建筑设计必须以谨慎批判的态度对待“现代”这个概念。“现代”建筑风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包豪斯”建筑。现今，这种建筑风格成为生态死胡同，我们只能以幽默的态度、巧妙的手段来对付它。早在30年前，德国斯图加特的学生公寓“包豪斯勒”（Bauhausle）就是此类反叛的杰出代表。在德国，我们从这些不同的思想、生活和建筑风格中认识到了向新的可持续文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中国的可持续建筑还处在一个艰难阶段，但这里也同时迸发出一种活力，我们需要把这种活力同德国专业人士的专有知识结合起来。中国有越来越多政治和管理界人士认识到，隔离效果好的建筑可以大大减少不断增长的供暖和制冷的能源消耗。在中国的德国建筑师事务所正在积极地致力于完善这些想法，并将它们付诸实践。

这一引人入胜的目录包含了无数设计师和工程师代表性的写照，他们把自己在德国高校或者德国企业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中国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中。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在此我不一一例举了，满怀热情地为城市规划者和规划委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中国能够实现既定的气候目标。

同许多领域一样：生态不仅仅是一个标签，更重要的是，标签上所宣称的必须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建筑设计、访谈和最佳实践案例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德中对话与合作。



施明贤 博士
德国驻中国大使

序

可持续成为当下中国城市环境设计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其在启蒙时间上则与欧洲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源头在欧洲，并且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甚至化作社会伦理范畴的问题。在德国，可持续发展首先在知识界发起，继而影响到民众，最后逐步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今天，专业界如果不贯彻可持续理念，老百姓如果不规范可持续行为（比如垃圾不分类），便会遭到众人的群起而攻之。可持续发展已经彻底重塑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中国建筑可持续的转折点是2004年，建设部发起了第一届全国绿色建筑国际大会，我有幸主笔起草了大会宣言，并担任随后成立的绿色建筑学会副主任一职。到了2005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环境部等四个部门联手的政府行为。第一届会议仅有400余人出席，到了今天的第八届，已具有五六千人的规模。国家决策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层面，学者的建言直接变为了政策，接着才开始在全社会普及，呈现了与德国相反的自上而下的模式。

这一变化正是大势所趋。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高速、投入型扩张，现在到了整体反思的时期。新一代领导的思想，从过去的“效率导向”过渡到以“公平导向”的和谐观，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而实现这一过渡的途径便是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不是随意的，是对整整25年的经验反思。从客观的角度去看，中国资源和环境问题进入了21世纪后，已经成为必须与国家发展道路和国家的全球战略一起考虑的时候了。

但面对这一变化，中国建筑与规划行业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了出来。过去，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行业，往往只停留在对可持续概念层面的探索，这是因为三方面的短缺：缺乏理论系统的支撑，缺乏法律条款和运作机制的支持，更缺乏扎实的技术和案例的传播示范作用。

德国学者、专家和建筑师的到来，正是响应了这一客观需求。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多方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中筛选可以借鉴和运用的元素。实际上，早期来华的设计师在德国本土并不有名，但他们积累了大量德国设计界的绿色技术，把拥有丰厚设计经验的大型公司的成果集成地带到中国。同时，这些德国建筑师也顺势将市场重心转移到了中国，在这个技术和体制都尚未健全的市场里，他们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

此书中谈到的德国同行在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带给我们很多的启迪：首先，德国有着严密的能耗计量方法，它的考量范围包括建造过程和材料制造在内的一切因素。虽然这套极度拘泥于细节的计量体系，在中国的推广并非易事，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其次，德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做了大量的单体建筑实验，其中的一些将建筑造价和能耗捆绑起来规划，而非无限制地加重“绿色”的砝码。这一寻找技术与经济平衡点的尝试，对我们也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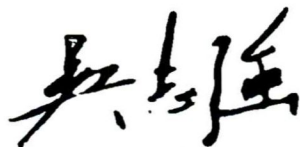
当然，德国公司在中国同样会遇到一些在地化问题。中国的变化太快，对于讲究程序化运作的德国企业来说很难跟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转向灵活的小公司反倒更容易扎根。程序化的运作，在一个成熟社会里固然天经地义，但当代中国城市尚在发育阶段，好比一个少年，每一天、每一寸都在变化，不适合以一个成年人的状态来对待。这是一个必经的成长过程，德国设计师需要转变思维定式，思考如何给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量体裁衣，避免太过豪华或太过精密，尽量理解服务对象的特殊需求。

从民族理念上来说，中德两国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我认为更能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用词是温家宝总理口中的“永续发展”，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目标。翻译本身就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德国追求精密、精确，善于看到危机以及如何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克服它；中国人则更加浪漫、宏观，不拘泥于怎样克服困难，而总在追求积极的理想目标和美好的愿景。这两种文化并不矛盾，并且相互补充：没有乌托邦、光有精密的方法是无法生存的，但徒有愿望、没有方法的支撑也是行不通的。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德国建筑师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本身的地域文化差异巨大，不同于德国的国家尺度。如果说全球有三个世界，那么中国就有四个世界。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比任何贫民窟更甚，最富裕的地方，则堪比世界任何一处。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状态，德国公司必须采用灵活的操作方法。

中华民族的许多知识是实证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古老的可持续智慧和技术是可以复活的。比如大屋顶在我国传统建筑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夏天，它可以减少太阳辐射，控制室温；冬天，起翘的屋顶让斜阳晒进屋子；在南方，它还是重要的排雨通道，有效防止地基的腐烂。大屋顶的曲线，巧妙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梁思成先生这一代人，尚没有机会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建筑，将留待我们后人去发掘和研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我们拥有众多的财富，一方面是民族的智慧，一方面是现代的精密科学。

事实上，绿色建筑只是一个载体，真正可持续的是生活方式。没有这种生活方式的辅佐，绿色建筑师犹如被架空一般，势单力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通过绿色建筑学会成立了不同的学组（工业建筑学组，医院建筑学组，住宅建筑学组，学校建筑学组等），并编写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读本，特别注重孩子们的动手创作能力和参与感。在如何树立下一代的“绿色观”方面，德国社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持续发展理念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我坚信二三十年后，中国必将在这一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博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
设计创意学院院长

目录

010 Johannes Dell

AS&P

013 上海安亭新镇总体规划

017 长春净月生态城

020 Stephan Suxdorf

Auer+Weber+Assoziierte

023 上海安亭新镇

027 上海辰山植物园建筑设计

031 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

034 Ludwig Rongen 秦瑾秋

Greenshine

037 全球被动式建筑研发项目

041 常州科教城

045 南通中德低碳节能产业示范园

046 Jens-Michael Kump

HPP

049 明斯特LVM7大楼

053 2010上海世博村

058 Jochem Jourdan

Jourdan & Müller

061 法兰克福天际线购物中心

063 法兰克福亨宁格住宅小区

065 法兰克福加鲁斯帕克办公楼及剧场

067 汉阳钢铁厂

068 Frank Krueger Pascal Hartmann

Logon 罗昂

071 天津星耀五洲德国别墅

073 济宁方圆矿业科技研发技术培训中心

077 上海玻璃博物馆

080 Christian Jünge

Rheinschiene

- 083 天津中新生态城
- 091 天津张家窝社会山
- 093 唐山曹妃甸生态城

094 李宏

SBA

- 097 上海虹桥低碳商务区
- 103 2010上海世博会世博轴
- 11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服务中心

112 Christoph Valentien 丁一巨

Valentien+Valentien

- 115 上海辰山植物园总体与景观设计
- 117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景观设计
- 123 慕尼黑机场改造

126 卢昕

- 129 昆山千灯新镇
- 135 重庆渝北区龙溪旧城改造

140 Roland Winkler

- 143 2010上海世博会汉堡案例馆
- 151 上海浦江智谷商务园办公楼

154 张蕾

- 157 建筑节能评估咨询项目

A photograph of a middle-aged man with a beard and mustache, wearing a white button-down shirt and a watch, leaning his arms on a light-colored desk. In the background, a dark rectangular sign with the letters 'AS&P' in a serif font is mounted on a wall. To the right of the man, there are some electrical outlets and a dark object on the desk.

AS&P

AS&P

AS&P 是基于何种契机进入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城市发展”主题是否也列入了考量之内?

首先,我们公司一直都以国际化为目标。在德国,许多城市规划事务所都没有海外业务,我们在这方面却有很多年的经验。其次,我们对中国的城市设计发展尤其关注。早在 15 年前,德国建造公司和投资商便意识到,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城市规划的领路人。

在我们公司,“可持续发展”首先被理解为“高效性”,这也是许多德国企业的运行准则之一。最早,“高效”一词来自机械制造业,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生产理念,不仅涵盖了能源的高效利用,还有通常所说的资源的高效利用。换句话说,越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就离成功越近,不仅是城市规划师,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长久以来,“高效”理念也解释了为何 AS&P 会设立自己的交通规划部门。因为我们认为,交通规划与城市设计同样重要,如果两者不能相互协调配合,那就谈不上效率,这在德国基本是公认的。我们来到中国市场,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高效”理念的重要性,涵盖了土地利用、交通、能源等各方面。对于 AS&P 来说,我们有着丰富的国际市场经验,这使得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

AS&P 在华事务所的中外员工比例是多少?

6 个外国人,16 个中国人,非常本土化。

您本人已经在中国居住了 15 年,您认为中德两国在城市规划理念上有哪些文化上的差异?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很多因素。中国——或者说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欧洲人觉得个人意志是一切的源头,而中国人更多考虑到团体利益。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它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语言、生活方式等。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喜欢将个人定义为团体的一部分,这个团体教会你对事物的基本认知,人们总是将事情看作是一个整体。但是德国人、欧洲人会先看每个部分,再把各个部分连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尽管我有一个中国妻子,在中国有了孩子,还在学习中文,但是我仍然无法跨越这道文化的鸿沟。

这些差异是否同样影响到人们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理解?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悖论:亚洲人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最终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我很喜欢的道家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人们不会去过度消耗环境资源,因为消耗环境,就等同于消耗自己。但是西方人,却提倡尽可能多地利用环境,掌控环境,这些甚至都写在圣经中。但现在,所有亚洲人都想要学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有什么好的呢?漂亮的车?好看的电视节目?但是过几年,人们就会因为过度消耗而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的。

Johannes Dell

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设计师,德国恺撒斯劳滕大学达姆斯达特工业大学建筑学硕士;于 1986 年加入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 AS&P 阿尔伯特·施佩尔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联合公司;1992 年成为公司合伙人,后进入董事会,成为 AS&P 公司董事;2000 年组织成立 AS&P 公司上海代表处;2007 年起兼任该公司在中国唯一全资子公司亚施德邦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AS&P 阿尔伯特·施佩尔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联合公司

1964 年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教授创建,近 50 年的时间里已成为拥有 140 余名设计师的德国顶尖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公司,在区域、城市和环境开发方面提供综合性服务,包括总体规划、交通/运输规划、城市和建筑设计、项目过程监理、项目管理以及施工规划和监理等。上世纪 90 年代,AS&P 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德国规划设计公司之一。

能源问题非常要紧。人生存主要靠三个因素：水、食物和土地，然后就是能源和资源。在德国，政府补贴能源利用，补贴的是稀缺能源，是需要人们节省的能源。中国政府也补贴，但补贴的是生产方。这也就是为什么节能技术很难在中国的建筑领域应用，法律法规也不起作用的原因。我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中国只有 70% 的建筑是按照建设法规建造的，其原因是因为没有独立的监控部门。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生态城”，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也没有人真正去做，因为它并不划算。在中国，能源很便宜，技术却很贵。开发商想要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建造商在一幢寿命只有 40 年的建筑上应用节能技术，而它的成本可能要到 50 年以后才能收回。建筑师和规划师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政治意愿的问题。但随着能源价格的持续上升，总有一天，中国需要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很多德国建筑师和规划师认为，在中国，规划的速度赶不上发展的变化，贵公司在赶上“中国速度”方面是否遇到过困难？

当然会有困难。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人做事看起来非常慢，但无论什么事都认真勤奋，而且讲求准确，这就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质量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中国人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这是合情合理的，现在的中国发展确实没有时间。我们不可能对那些因为农业生产工业化而失业的人们说，你们等一等，先待在农村挨会儿饿。我们需要时间建造城市，现在没有工作给你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加速。这就意味着质量可能会被忽视，因为资金、质量和时间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既要赶时间，又要保证质量，就必须有很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资金，又没有时间精雕细琢，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贵公司是如何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平衡，只能降低质量。官方统计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 40 年，但在德国差不多是 140 年。这不单单是因为德国人更懂得维护建筑，而是因为德国建筑的结构质量要好得多。中国的建筑业现状肯定是低效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房屋质量太差，30 年后或许玻璃都从窗框里掉出来了，到时该怎么办？稍加修整，还是全部推倒重建？

您曾经向管理者提出过这些问题吗？

当然有，我一直在提。上一次我在发布会上向一个官员表达了 my 质疑。他不断地说：“我们做的是绿色建筑、零碳建筑。”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先提高中国的施工质量，延长中国建筑的使用寿命呢？这是提高可持续性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终止了采访。

您曾提到，根据以往在华项目的操作经验，您认为“过程管理”在中国尚未达到相应的水平，也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针对这个问题，贵公司提出了哪些建议？

我们认为应该加强各方的交流，将交流透明化。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被问到时才会发言。比如开会时，有人对正在讨论的话题有更好的理解，或者他意识到发言人说的根本是错的，但他不会出声，因为怕领导或其他人不接受他的想法，这就是交流过程中的不透明。只有当你不怕丢面子的时候，才会站起来说出自己的意见，否则遭殃的将会是整个项目，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另一个方面，可持续项目需要同步配套，但发展商和管理者都不愿久等。正常的情况是，建造一个新城市时，应该先把有利于居民的基础设施、公交系统、商业商场、幼儿园和学校等建立起来，否则没有人愿意住在一个“空城”里——房子矗在那里好几年也没有人住，这绝不是可持续。比如安亭新镇，就是我们在中国学到的第一课。

面对中国建筑业和城市规划业的现状，在中国做项目时，必须把设计理念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贵公司遇到过哪些困难？

比如在安亭新镇的项目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既要创造欧洲式的公共空间，又要同时满足中国居民对住宅的一些特殊需求，比如朝向，这样的结合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所有房子都排成一列，这在德国意味着单调无聊，毫无特色，在这里却非常普遍。还有一个例子是最豪华高端的独栋别墅，看上去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这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想象。没有人会买那样的房子，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家有独特的、个性化的外表。此外，公寓面积也完全不同：欧洲公寓相对比较小一些；而一个中国家庭通常包括父母、孩子，甚至还有祖孙辈，还可能包括一位“阿姨”（家政服务人员），这样一来公寓的面积就必须很大。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以及在城市规划、社区建设、空间布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反思我们的德国思维，反思欧洲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安亭新镇的项目，实际上需要欧洲经验为中国民居所用，而这种协调是一个很复杂、很艰难的过程。

您对安亭新镇的现状了解吗？居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规划模式？

这要看情况，有些人满意，有些人则不。安亭新镇里有很多台湾人，起初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点。他们不在周边工作，可能只是发现了这里，觉得比起上海的其他社区，安亭的质量更好一些，就口口相传。他们也很喜欢安亭的绿地和开放空间。当然在那时，安亭的房价还是很便宜的。目前，安亭还有另外第 3 期工程正在规划和建造中。

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展安亭新镇项目，贵公司的规划和设计会在十年前的基础上做何调整？

我们会尝试着将施工问题考虑在内，让我们的规划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不会再给出一些在德国非常普遍，在中国却实施起来比较麻烦的意见，尽量避免这样的纠纷。我们可能会尽可能多做一些南北朝向的住宅，运用其他方式创造想要的公共空间，不会再像原来那样，严格死掐开放空间的概念。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之前最根本的误解是什么：客户总说要一个“德国小镇”，其实并非如此，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德国式样的“中国小镇”，只是德式的外表，内涵还是中式的。

Anting New Town,
Shanghai

上海安亭新镇总体规划



安亭新镇坐落于沪宁高速以北、吴淞江以南，总面积为 5.4 平方公里，是上海国际汽车产业中心的配套设施，可容纳 25 000 人居住。总体规划由德国 AS&P 阿尔伯特·施佩尔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联合公司编制，多家德国建筑师事务所获得了参与的机会，各自在所限定的分区内进行建筑设计。在最初的总体规划中，安亭新镇确立了以德国风格为主要特色，包含德国式的公共广场、中央绿带、围合街坊、自由曲线的环形路网和水系等，形成了严谨的布局结构。



安亭新镇一期 11 号地块规划于 2010 年, 内含建筑面积约 100 000 平方米。由 AS&P 公司负责其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



安亭新镇的规划结构可以概括为“一心、一带、三环、指状景观轴”，即：公共商业服务中心区、南北生态绿带、外环（结构生态围合）与中环（护城河景观）与内环（公共开放空间体系）以及“指状景观轴”。由两个公共服务设施带与四个不同特色的住宅片区组成，丰富多样的住宅类型如：公寓、联排、独栋和小高层等，在形态、功能、房型和价格上满足了不同定位目标客户群的个性需求。



安亭新镇所处的国际汽车城拥有五大功能园区：汽车核心贸易区、研究开发区、国际赛车场、以汽车领域为主的大学教学园和拥有特色风貌的生态环境生活区，以及一条完善的汽车产业链：汽车贸易，研发制造，科教博览和全方位的汽车服务。

安亭新镇一期 12 号地块规划于 2011 年，内含住宅建筑约 80 000 平方米，公共建筑约 2 700 平方米，由 AS&P 公司负责其详细设计、建筑设计和建筑立面控制。

安亭新镇一期东块规划于 2011 年，内含住宅和公共建筑共约 630 000 平方米，由 AS&P 公司负责其详细设计和建筑设计。



您个人对可持续城市的理解是什么？

联合国对于“可持续”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粗略地说，一个城市需要有良好的治理。这意味着它要有明确的界限，并让人觉得安全可靠。在这个范围内，可持续城市要有合理的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和工作环境，不能过度吵闹，不能过度污染，也不能影响自然环境的再生。按照这样的定义来看，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城市的扩张和发展，必然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

联合国与世卫组织还提出过另一个概念，“健康城市网络”，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密。一个城市应该满足居民的基础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城市应该给予市民认同感。我们有一种说法叫作“社区关怀”，可持续城市不仅代表自给自足、自建房屋，也意味着一切规划，都是为了让人们认同自己是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如果城市只是一个巨大的、毫无分割的城市体，个人在其中会找不到方向和归属感。我们需要一些网络或是坐标，帮助我们确定自己的位置。

欧洲和西方世界对空间的体验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极大地影响了城市规划。西方人对于城市空间布局，尤其是公共开放空间的理解很不一样。在欧洲城市，从私人领域到公共空间之间，会有许多半私人、半开放的过渡空间。但是在中国，公共开放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没有这么多“步骤”。比如大型广场是开放空间，而自家后院就是一个私人的地方，这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的选项。中国的小区基本都没有门禁和围墙，而这在欧洲基本没有。

AS&P 提出了“大尺度城市规划”的概念，这是贵公司来到中国以后才开始的研究吗？

不是。在进入中国之前，我们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做过大尺度的规划和设计。“大尺度”与项目面积无关，而是与需要多少基础设施和要素有关。如果只是在已有的城市旁再延伸开一个区域，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已经有了，即使这个区域再大，也不能说是大尺度规划。反过来，一个规划如果旨在创造、发展、设计、整合各个独立的区域，将一切都连结重组起来，即使面积再小，也是一个大尺度的项目。项目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尺度的大小。

能具体解释一下贵公司是如何将可持续理解落实到大尺度规划中去的吗？

其实落实的情况并不好。比如在安亭新镇，我们想要运用一些建筑隔层、独立电站等技术，改进小区维护和管理。最后只有部分措施应用了，而且也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在施工建造的细节上。还有一个问题是缺乏同步协调。我们规划了一个可供50 000人使用的电厂，但为了庆祝某人的生日，所有房子都必须赶工完成，导致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以至于现在，那个原本计划为50 000人供电的电厂实际只为2000人供电。这其实非常没有效率，还不如把它关了。

城市可持续还包含一个重要议题，即交通。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峻。您刚才提到 AS&P 有独立的交通系统规划部门，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方面，贵公司提出过哪些建议？

拿北京的“环路”交通系统举例来讲，环路一圈一圈地围在外面，向外扩展，这样一来，整个城市体就是一个未经划分的大块。如果你想从这个地方到达那个地方，就必须上环路，而这两点之间又没有公共交通，只能自己开车过去。

让我们设想另外一种城市模式：它的道路和轴线都向外发散，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中心，而是有若干个小的城镇中心围绕。在这些地方就可以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中心与周边、中心与中心之间，都有公交系统相连，不需要开私家车便十分便捷。

当然，说比做起来容易多了。举个例子，要在现有的城市上扩展出一片新区，最好能够先建立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地铁，但谁会为此买单呢？只有在房屋出售后，这部分投入才可能收回，因此必须有人先投资或预投资。

您所说的发散型道路规划模型对任何国家或城市都适用吗？

不是，每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这个模型的关键在于分块化、去中心化，不同的尺度中都必须避免大块集结。生物器官和组织也是这样运行的：如果你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是一样大的，没有主次之分，这简直就是怪物。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的交通系统不好用的原因。

AS&P 在郑州的区域规划项目中引入了“绿网系统”，它是怎样解决中国城市“大块集结”的问题的？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需要在郑州和开封之间规划一座新城，区域面积大概为1800平方公里，包含了所有功能和设施：大学、住宅区、城市副中心、次级政府、物流中心等。我们发现，“去中心化”模式能够更好地安排和组合这些功能。比如，我们需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可容纳50 000个工作岗位的物流中心。我们选择在其周边分散建立住宅区，不同的区域之间由绿带和绿道相连，不仅对地区的微气候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还为动物提供了进入或是穿越城市的走廊。

当然，“绿网系统”并不适用于任何城市。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口在45万左右的小城市，要步行穿越它自然很方便，那就没有必要再加上这样一套系统了。但如果是一个有500万、1 000万甚至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就必须考虑联系网络的问题，否则就会像北京那样。在北京，步行根本没用，走路穿越长安街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在北京居住过，非常喜欢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但它的缺陷也是致命的。

您认为中国目前在可持续城市规划领域有哪些优势？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在未来一定能够走上高效、宜人、可持续的道路，但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来实现？在我看来，目前为止，只有中国给出了一些答案。非洲和南美洲国家都没能做好，北美、欧洲和日本已经发展完了，在这方面也不会有贡献。所以现在，只有中国在努力寻求答案，而且已经颇有成效。